



深圳福田红树林一隅

用生命赞美生命

□刘醒龙

“被保护在城市中央的红树林，不应当成为被保护在动物园中的狼。”这是我穿行在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时，忽然冒出来的一个念头。

在那片看上去与南方多数树林没有多少区别的红树林中，分明有着极具象征意义的不同。一路走着，正前方的林缝里，透露出一座光鲜耀眼的城市。再多走几步，穿过树林，来到一处滩涂，隔着浅浅的、似乎能一口气游过去的海湾，那边就是多少年来一直在引领城市文化潮流的香港。转过身来，让清凉的海风吹过汗津津的脊背，眼前高高的树梢上，是一片更加高耸的摩天大楼。作为现代化国际都市的深圳，仿佛就藏身在这片红树林中。

与第一次在广西北海边见过的红树林不同，那里的红树林如同周边万物，无不受到天地之宠爱。与第二次在海南岛见过的红树林也不同，那里的红树林更像是受到万顷南海生生不息之恩泽。

深圳这里的红树林，既是活生生成长的一种寓言，又是深圳人透过钢筋混凝土的楼群，透过科技信息爆炸的声浪，清亮地唱出的一首用生命赞美生命的颂歌。甚至让我想起，第一次遇见狼的情形。

“小心遇上狼”这句话，小时候经常听到。长辈们所说的狼，是一切危险的代名词。2017年7月22日，我参加“万里长江，人文行走”活动，抵达可可西里时，曾经遇见一匹狼。

那一天，我们从可可西里边缘的曲麻莱县城出发，车行60公里，到达通天河边的一个牧民家中，请他们带路去通天河。在辽阔的可可西里荒原，说他们家在通天河边，其实距离通天河还有好几公里。如果不是牧民带路，则有可能要绕行十几公里，甚至是几十公里。

在长江源头，不要说雪山边、草原边，就是一只羊的旁边、一头牛的旁边，那距离与空间，

都足够令人感叹。汽车翻过几道沙岗，驶过几道沟坎，前车扬起的沙尘落下后，一片宽阔的水面终于出现了。

那地方，往上去不远就是长江北源楚玛尔河入通天河的河口。过了那河口，再往上就是万里长江的正源沱沱河了。大概是草原宽阔的缘故，作为上游的通天河反而比下游的金沙江宽阔许多。

在通天河边待了半小时，看看时间，都晚上8点了。虽然天色仍然很明亮，我们还是决定离开通天河。返回的途中，翻过一道沙岗，又翻过一道沙岗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狗一样的动物出现在沙石道路的右边。由于沙尘太大，我们乘坐的越野车一直与当地的前导车保持着百米左右的距离。那狗一样的动物从容不迫地从右往左越过我们的车头时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两声：“狼！狼！”车上的人也像是猛醒过来，司机也下意识地踩下了刹车。大家一齐叫起来：“是狼！是狼！”

毫无疑问，一匹大灰狼就在我们眼前，不紧不慢地穿过沙石路，轻轻跃过路旁那浅得不好意思称为排水沟的水沟，又毫不费力地蹿上水沟边的陡坡。陡坡上面是很绵延也很美妙的沙丘，以及沙丘最高处的沙岗。那些沙粒全是由唐古拉劲风从通天河中吹上来的。那匹狼在上面似走又似跑，看看离沙岗岗顶不远了，那匹狼回过头来看了我们几眼后，用绝对均匀的速度，越过沙岗岗顶，消失在霞光里。

回到牧民家，我们还没说什么，牧民们就走上前来，冲着我们连声说了三句：“扎西德勒！扎西德勒！扎西德勒！”经过当地人的翻译，才知道，第一句“扎西德勒”是表示，我们遇上狼是给他们带来了吉祥；第二句“扎西德勒”是表示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吉祥；又因为狼是从我们右边往左边走，第三句“扎西德勒”是表示吉祥中的吉祥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从曲麻莱当地诗人的一首诗作中读到：“前方有几匹狼出现/走走停停消失在山间/传说/途中遇狼是平安的吉兆/我们为此兴奋无比/高诵祈福颂词/感念神灵庇护。”但诗人没有在诗中说，如果狼从一个人的右前方往左前方走过去，那就更加吉祥了。

我清楚，这是自己第一次遇见狼，而且是在可可西里最边缘。那匹狼用当地牧民最喜欢的方式，从我们的右前方走向我们的左前方。我努力去想，如果这是真的吉祥，那会意味着什么？

有一句俗话说：“狼若回头，必有缘由。不是报恩，就是寻仇。”迄今为止，那匹狼是这辈子我在野外环境中见过的唯一的狼。在充满转世与轮回的可可西里，或许上辈子曾经有过让狼一代代不曾忘记的善举，而使那匹灰狼必须与我们发生这样的交集。

后来，我一直在想，在古今中外关于狼的文化中，何曾有过吉祥的象征？那著名的《狼来了》的故事中，放羊娃为了捉弄人一再撒谎说狼来了，轮到狼真的来了时反而没人相信，自己放的羊全被狼咬死了。在《狼和小羊》中，狼为了吃掉小羊，不惜编造莫须有的罪名，非要将小羊吃掉。那《披着羊皮的狼》以及《东郭先生和狼》的故事，也是天下少年全都耳熟能详的寓言。如此种种，几乎是普世的常识，为何通天河边的牧民，非要将狼的出现认作是一种吉祥呢？

在我所居住的长江中游地区，很久以前就没有了狼，狼的故事却一直没有间断。最有名的故事里说，夜里走山路，如果有什么东西突然从后面拍一下自己的肩膀，千万不要贸然回头，因为有可能是狼。只要一回头，狼就会一口咬住人的喉咙。这个传说让我忽然明白，为何狼在右边出现时是吉祥中的吉祥——当独狼怀着攻击人的恶意时，出现在右边的狼既不可能从背后下手，也不可能从左边发起袭击，唯有从

人的右边开始进攻。对于身陷险境的人来说，在所有不利因素中，这种情况大大有利于人。狼从右边来，习惯用右手操持武器工具的人，应对起来更有力量，获胜的机会也就更大，对人来说，当然就是吉祥中的吉祥了。由此我进一步联想到，在可可西里荒原，能够养活一群狼，需要有足够让这些狼不至于饿死的肉食。而要保有许多可供肉食的食草动物，又需要有足够的植物供给，促进它们的生长。拥有一片植物足够茂盛的荒原，牧民家的牛羊就能养得膘肥体壮，所以说，有狼的地方，一定是牧民们安居乐业的地方。如此怎么不教他们觉得吉祥如意、扎西德勒呢？

狼故事背后的意义，正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。可可西里的牧民，将狼与生态环境的关系，凝练成日常生活中简简单单的文化。将复杂的科学道理，用文化的形式来表达，一说就懂，一点就破。我想，只有这样才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方法，同时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最好状态。

在红树林面前，一切顶着人类头衔的人，都会情不自禁地表示叹为观止。面对摧毁值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海潮，一棵树为了自身种子的繁衍生息，居然有着类似可可西里狼的本领，异想天开地进化出胎生的方式。只需要海潮退还滩涂的一个瞬间，便像狼婆一样喷薄而出，将不用啼哭的生命之树，深深地扎根在泥土之上。

曾经为南海边的红树林写过一段话：“或者可以这么说，同样是胎生，人类从海洋爬起来时，只要犯些许错误，就有可能长成这红树林的样子。今日之世界，与其说人类干得不错，实际上，本应该是红树林替人类完成了更辛苦的使命。所以，保护红树林，本质上是在保护人类自己。不只是红树林有着对人类的良好功效，还在于红树林所拥有的哲思实践，早已是人类的楷模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将红树林真诚地当成一

种信仰，人类才有可能进退自如，安然若泰。”

2020年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红树林保护区内构建了“空天地”一体化平台，实现对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精细化监测。借助新安装的23个高清摄像头和31台红外照相机，对保护区内的重要区域进行全天候不间断全覆盖监测。再配合人工智能自动识别与监测系统，不仅可自动识别不同鸟类，还能对鸟类进行跟踪。哪怕是几百只飞鸟同时出现，也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完成识别并计数。这既避免了动用人工抵近观测的干扰，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红树林中自由自在的原始状态。

被保护在深圳城区中央的红树林，没有成为被保护在动物园中的狼。虽然身居闹市，一切仍是天成。红树林下，海潮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跳跳鱼想怎么跳就怎么跳，黑翅长脚鹬想怎么舞蹈就怎么舞蹈，那标明了全株有毒的海芒果树想怎么生长就怎么生长。还有十万只春去秋来的候鸟，还有比周边城市人口多上许多倍的动物与昆虫，全都活在自身本该活着的世界里，不被打扰，不被伤害，不被调戏，不被约束。这也是用生命赞美生命的一种信仰。

我想，在社会生活中，我们一定要摒弃以主导者的身份对生态环境进行定义，不对对自然万物的征服、对天下资源的占有作为惯性思维。让我们的主观意识，真的成为万物共生、天人合一等基础逻辑的组成部分。不再将最优的生态环境作为人类最优的生存条件，而是将人类本身纳入最优生存环境的完整体系之中。一匹狼可以是吉祥的具体象征，一个人更应当是吉祥的具体体现。人类需要学会尊重每一条河流、每一座山峰，珍视每一株草木、每一只昆虫。生态环境从来不是单一物种的平安顺遂，而是自然万物的共生共荣。只有放下以单一物种为中心的想法，才能永续生态环境中的吉祥。

91岁，我加入了中国作协

□孙建英

有着七十多年写作经历的老作家，在91岁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——我想，这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应该是少见的。我生于1935年7月，今年91周岁。在2026年中国作协发展的数百名新会员中，我觉得自己犹如万木春天里的一棵病树，顽强地展示着岁月的风雨沧桑。

有朋友问我，你在桐柏山区文坛上苦心耕耘了七十年，作品累累，是文学豫军和南阳作家群的重要作家之一，曾与南阳作家群代表性作家乔典运、田中禾、周同宾同时代并齐名，还培养了大批文学艺术人才，为何到现在才成为中国作协会员？

这个问题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得从我幼年的家教和从事文学的初心说起。

1935年，我出生在河南省密县（1994年撤县设立新密市）一个叫河屯的农村，在旧社会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。我亲历过新旧两个社会，既体验过旧社会农民生存的艰辛，也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。1941年，我刚满6岁，父亲被汉奸杀害，母亲含辛茹苦养育我这个独苗。母亲是小脚，我家的二亩薄地，全靠她操劳。母亲没文化，却坚持让我读书。为了给我凑学费，她把家里值钱的东西，包括她出嫁时娘家陪送的箱柜桌椅等物件，都一件件变卖了。母亲的愿望很单纯，教我多读点书，学会记账算账，长大了学个手艺，成个家，安安生生过日子。母亲是穷日子过怕了。我小小

年纪就受母亲的影响，没想过要出人头地。

我的求学道路十分艰难。我是背着母亲做的玉米面饼子和腌制的咸菜读完中学的。在荥阳高中读书时，学校离家100多里，翻山越岭步行，背一回干粮吃一星期。热天，干粮容易发霉，长毛了，就拿到操场上晒晒，再用开水泡泡，就咸菜吃。像我这种童年经历，不少人是说不出口的，他们觉得不光彩。我从不隐瞒，那是母亲用汗水和眼泪浇灌我成长的一段难忘的童年岁月，隐瞒了就是对不起母亲的在天之灵。要说真话，也是母亲的教诲——这个观念成了我毕生坚守的律条。

1956年，我高中毕业，考上了太原工学院。我把录取通知书念给母亲听，她哭了。我知道母亲的心事，她希望我继续读书，却实在无力供应。几位家族长辈都来劝我放弃读大学，我含泪答应了。后来经母校推荐，我被当时的河南省建筑工程厅招录，开始带薪在勘测技术培训班学习。结业后，我当了一名勘测技术员，后参与创办《河南测绘》小报。1957年，我在《百花园》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《五件旧衣服》。这是我的处女作，记录了母亲含辛茹苦的往事和我的虚荣、自责。由此，我开始了长达七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。

1958年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我作为河南省建厅的青年干部，被下放到桐柏山区，和农民“三同”。我住的那个村庄叫中间畈，景色如

画，民风淳朴。我很快就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山村，融入了这片红色土地。永远忘不了房东白大叔、白大婶和全村父老对我的照应。下放一年里，我学会了育苗、插秧、割谷、打场等农活，还在《河南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了十几篇反映桐柏山区民风民情的作品。我创作的相声《下农村》获得河南省第一个五年计划文艺创作二等奖。

1959年，我回到河南省建厅，任《河南测绘》编辑、记者。1960年，单位合并调整，我主动要求到桐柏县落户，从此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扎下了根。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我先后在《桐柏报》社、桐柏县广播站、文化馆、文化局、宣传部、文联等单位工作过，一年有七八个月都在农村奔走。艰苦忙碌的工作，让我读懂了豫南山区的山水风貌和民风民俗。1965年10月，我在“社教”工作中“火线入党”，完成了一个青年作家到党员干部的转型。

桐柏县是千里淮河的源头，古称“淮澳”，是革命老区，因长篇小说《桐柏英雄》及取材于此书的电影《小花》而闻名遐迩。“桐柏英雄”已成为桐柏老区的文化标签和精神象征，是文学地理学的新文学景观。后来，有评论家将我的“桐柏山”系列作品，概括为对桐柏英雄与桐柏文学的丰富和深化。想来，放弃省城的工作下放老区看似不幸，却为建设老区作出了一些贡献，实现了当年的青春誓言。

在桐柏县文化馆工作期间，我着手组织“文学

创作组”，每个星期天组织研讨会，学习讨论文学知识。愿意参加的年轻人很多，发展到了30多人。后来，我参与筹备成立桐柏县文联。1986年，桐柏县文联召开第一届文代会。文联在县里本是穷单位，桐柏当时还是全国贫困县，申请经费非常困难。为了给作者办个学习交流园地，我们自筹资金创办《淮源》期刊、《桐柏山》小报。组织作品研讨会没有经费，就号召作者自带干粮，到野外山林里或小河边，找个清静处围坐开会。大家很积极，很热情，也很团结。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文联主席，而是以作者成员和文友的身份，和大家相处。我主持文联工作的十年间，作者群没有人称呼我“主席”，都叫我“孙叔”或“孙老师”。那几年，桐柏文联的发表作品的数量和各项活动，都名列全地区前三名。

进入新时期，我的小说创作进入喷发期。1978年，短篇小说《麦花嫂》在《河南文艺》第3期上发表。随后，在《奔流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安徽文学》《莽原》等报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。迄今，我已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戏曲、新故事、诗歌等300余万字。1991年12月，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，我被评为“文学创作二级”职称。

退休后，我的创作进入新阶段。我曾创办网络博客“葫芦居”。70岁时，我编辑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走出雪谷》、散文集《与山对话》、幽默故事集《千年等一回》。75岁时，我创作出版长篇历史小说《御赐剑》。80岁时，我编辑出版散文集《履痕》。米

寿时，我出版文集《秋天的视觉》。2022年，我在《躬耕》上发表的酝酿了三三十多年的短篇小说《山神》，入选了湖南、安徽中考语文试卷。

2024年，我90虚岁，学生们张罗总结我的文学成就。2月，《中原文学》推出诗人、评论家陈立红撰写的万字创作述评《桐柏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》。3月，《焦作晚报》刊发黄凌的评论《桐柏文坛老英雄孙建英》。7月，按“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”体例编辑的《孙建英研究》出版，反响热烈。9月，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在“对话名家”专栏推出专访《孙建英：桐柏之间，老树常青》。这些来自文学界的关注和肯定，让我这个九旬老人充满感激，仿佛又年轻许多，浑身充满了继续写下去的力量。

成为中国作协会员，是很多作家的梦想。因为这代表着对一个作家的认可，也是一份得来不易的荣誉。但我过去从没主动争取过，因为我性格孤僻，不爱交际，有这两道坎过不去。没想到，到了这把年纪，中国作协改了人会办法，可直接在网上申报，只要作品过硬，就能获得批准。我为中国作协的改革叫好，文学事业需要这样的清风正气。

感谢朋友们的关心，关键时刻给我联系，帮我填报网上申请。我终于成为中国作协会员，为我的文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作家都有年老的时候，但我相信，中国文学之树常青。